

[英] 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Freedman) 著

王 坚 马娟娟 译

A History

STRATEGY

一部历史

战略：

[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Strategy: A History 战略：一部历史 [下]

[英] 劳伦斯·弗里德曼 (Lawrence Freedman) 著 王 坚 马娟娟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略：一部历史：全 2 册 / (英) 劳伦斯 · 弗里德曼 (Lawrence Freedman) 著；王坚，马娟娟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1

书名原文：Strategy: A History

ISBN 978 - 7 - 5097 - 9822 - 5

I. ①战… II. ①劳… ②王… ③马… III. ①世界史 - 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5715 号

战略：一部历史 (上下册)

著 者 / [英] 劳伦斯 · 弗里德曼 (Lawrence Freedman)

译 者 / 王 坚 马娟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张金勇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31.75 字 数：727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822 - 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4 - 156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48.00 元 (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前 言	001
-----------	-----

第一部分 起源

一 起源 1：演变	003
二 起源 2：圣经	012
三 起源 3：希腊人	028
四 孙子和马基雅维利	054
五 撒旦的战略	071

第二部分 武力的战略

六 新战略科学	091
七 克劳塞维茨	108
八 伪科学	126
九 歼灭战或消耗战	142
十 头脑与肌肉	162
十一 间接路线	176
十二 核竞争	190
十三 非理性的理性	205

十四	游击战·····	235
十五	观察与调整·····	255
十六	新军事革命·····	282
十七	战略大师的神话·····	312

第三部分 底层的战略

十八	马克思及其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战略·····	325
十九	赫尔岑和巴枯宁·····	349
二十	修正主义者和先锋队·····	371
二十一	官僚、民主人士和精英·····	396
二十二	规则、神话和宣传·····	425
二十三	非暴力的力量·····	455
二十四	存在主义战略·····	485
二十五	黑人的权力与白人的愤怒·····	519
二十六	框架、范式、话语和叙事·····	551
二十七	种族、宗教和选举制·····	576

第四部分 上层的战略

二十八	经理阶层的崛起·····	613
二十九	企业的天职·····	634
三十	管理战略·····	657
三十一	商场如战场·····	677
三十二	经济学的兴起·····	688
三十三	红皇后与蓝海洋·····	703
三十四	社会的挑战·····	724
三十五	计划型战略或应变型战略·····	739

第五部分 战略理论

三十六	理性选择的极限	767
三十七	超越理性选择	785
三十八	故事和剧本	807
致 谢		838
注 释		841
索 引		952

出身弱势群体的活跃激进政治力量，一支出自富裕的主流人群的队伍当然更加出人意料。而且渐渐地，人们开始把 SDS 当作一种超越政治范畴的、广泛的文化转变。上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来自大萧条和对德国、日本的战争；而下一代人则成长于相对舒适的环境，传承下来的社会约束令他们沮丧。两代人之间由此产生了代沟，这反映在人们对音乐的喜好、对性的态度、对吸食软性毒品的看法。取自反殖民斗争的“自由”成了这十年中的关键词。任何组织都用这个词来标榜自己，包括妇女和同性恋者在内，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社会传统和过时法律的束缚。因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向国家权威发起了挑战，这是一种个人主义行为，并非出于什么集体灵感。

这有助于解释正统左派为什么对此颇为不适，这些人都是集体主义者，对国家的前途和工会的角色充满热情。他们一直被富裕生活边缘化，他们的豪言壮语听起来像是旧日成败的回响，其内部政治的特点仍是共产主义者、托派分子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混战。而年纪轻轻的激进主义者刚刚结束南方的“自由之行”，他们在那里要么坐牢，要么挨打，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在四处推销社会主义理论蓝图的人。虽然 SDS 最初旨在成为工业民主联盟（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的一个分支，但最终还是与之分道扬镳，沿着自身的轨道发展起来。而作为约翰·杜威的另一桩事业，工业民主联盟后来则成为美国社会主义团体中亲工会、反共的一派。因此，人们反抗的不仅是美国自鸣得意的自由主义及其主流社会的保守主义，而且还针对社会民主传统。这是一种群众性政党按照各方认可的程序组织起来对抗议会选举的传统，它反映的是一个或多或少具有内在连续性但此前从未真正在美国扎根的意识形

态。这些新派激进分子是更加彻底的自由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反精英传统者，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本真，为此甚至不惜丧失理智，怀疑所有权威和组织纪律。他们不再听任那些超然于外、遥不可及、只顾自己利益的人来做决策，而是想方设法让普通人参与决策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1962年SDS在密歇根州休伦港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活动地点召开成立大会。其间，SDS与工业民主联盟中的社会民主派发生了一场冲突。汤姆·海登（Tom Hayden）是一名密歇根州的学生记者，他领衔撰写了SDS用来鼓舞士气的《休伦港宣言》（The Port Huron Statement）。他在描述自己的疑惑时曾写道：“那些看上去不苟言笑的人居然会如此无休止地陷入相互离间、吹毛求疵的论战。”“作为一种成长经历，”他写道，“我们学到了一种不信任和敌意，它针对的是过去与我们关系最亲密的人、自由派的代表，以及那些也曾年轻过、激进过的劳工组织。”¹反过来，老派的左派分子则对年轻积极分子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工会态度冷漠，也不热衷于谴责共产主义。这些新派激进主义者非但不会一丝不苟地分析经典著作，还对其理论持怀疑态度。政治行为必定是价值观和情感的最真实表达。信念总是高过一切算计的结果，这反映的是一种谨慎的权宜之计和拒绝为政治效果而妥协的态度。有时，深思熟虑的系统思想看上去是不可信的，只有自发意识（不管它有多么不可言喻、难以理解）才值得信任。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早期曾是一名激进分子，后来成为一名新左派分析家，他认为行动可以被用来“夸大”信念。其“判断标准是参与者的感受”，就好像药物让人的精神状态起起落落一样。如果这是一种极具价

368

值的直接经验，那就没有什么长远考虑的余地了。²

这一点让新派激进分子陷入了韦伯的悖论。虽然韦伯为社会和政治的稳步官僚化而沮丧，但他认为忽视其功能的逻辑性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新派激进分子的新兴政治形式秉持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伦理，其手段和目的之间是不分离的。他们的每一次让步、对核心价值的每一次拒绝都意味着失去了某些珍贵的东西，不管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它都在一次次地消逝。他们那些以静坐为首的战术，本能地挑战了所有规则。他们明显既缺乏理论也没有组织性，他们陶醉于激进主义却没有明确的方向。其中蕴含的理念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存在主义。

这次存在主义战略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各种特点使其在文化上表现得如此解放，实际效果如此持久，以致在政治上触怒了各方。当明确表达出来的立场见解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依据，而非随着各种可能出现的结局而摇摆时，让步妥协就很难实现，各种临时结成的联盟就会变得很脆弱。如果没有等级制度，每一次决策都会充满挑战和审视，组织会变得效率低下、行动迟缓，在实现决策的时候会表现得犹豫不决。怀疑理性、相信感觉的激进分子变得愈发愤怒。他们厌恶权宜加妥协的政治，使自己被隔绝和孤立起来，当有坚实理论支撑的组织或者先前曾反叛的纪律严密的组织发起干扰时，他们就很容易遭到破坏。

369 叛逆者

马克思原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两极化的阶级斗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显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自满知足、未出现分化的大众社会。拿薪水的中产阶级正处于上升之势，他们大多属于一些大型的非人格性组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虽然并不折磨人，但似乎还是缺失了点什么。人们议论的并非日益加剧的痛苦和贫困，而是一种因心理空虚而不是物质剥夺所导致的枯燥乏味。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著作《有组织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提到，美国中产阶级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它反映在标准化的职业发展路径、消费者品位和文化敏感性中，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顺从。他认为，其中的责任不在于组织本身，而在于信仰，“温和地否认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冲突”。³事实上，包括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和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白领工人》（*White Collar Workers*）在内，有关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作品都表明，中产阶级的崛起并不是一件充满愉悦的事情。

里斯曼认为，有主见的人会追随早年立下的人生目标，具有很强的价值观，一旦偏离了那些价值观就很容易因为罪恶感而遭受内心折磨。他们逐步让位于那些缺乏自主性的人，后者从周遭环境中寻找答案，从自己的同龄人甚至大众媒体中获取人生的方向。这两类人的区别在于，人们遵循的是自己内心的陀螺还是一个外部雷达。《孤独的人群》是众多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早期的进步派人士将缺乏自主性当作捆绑社会、激发民主敏感性的方式，然而，相比之下《孤独的人群》一书则指出（也许超出里斯曼自己原先的预期），通过大众媒体不加鉴别地传播社会规范和政治态度是有害的。⁴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The Fear of*

Freedom) 一书的主题也是适应社会环境的风险在于否定核心价值观。弗罗姆是一名德国犹太难民，他提醒人们，那些从因循守旧和独裁主义中寻求安全感的无根个体是很危险的。自由不仅仅意味着缺乏限制约束。自由须更加积极、有创造性、真实可信、富有表现力，是自主自发的，无须格外敬畏专家们的公认智慧或规定的常识。社会结构的作用是压制人性自然、积极的一面，而非抑制消极、强制的那一面。⁵

370 二十世纪热衷于文化发展的人士将这种现象看作肯定了人性中积极的一面，用以对抗因循守旧的公司国度。1970年，当西奥多·罗斯扎克 (Theodore Roszak) 赞许地回顾前十年时，他将众多发展成就描述为对“技术统治论”的回应。作为对韦伯的呼应，它被说成是融合了精神状态的企业权力。在这种精神状态下，

人类的各种需求完全让步于某种形式化分析。进行这些分析的则是掌握了某种令人费解的技能的专家。他们可以把这些分析直接转化为一种经济和社会事业、人事管理规程、商品化和机械配件的聚合体。

这些专家往往身处企业的核心部门，他们认为人类的大多数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如果说哪里出现了问题，那也是误解造成的。⁶ 罗斯扎克主张，贫困、文学、社会学、政治传单以及当时的各种示威游行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挑战这个技术统治论假设。从这方面来看，这十年的政治中，不管是挑战官僚主义还是科学专业知识，无论是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还是贬损传统行业，一切只不过是大规模反抗理性的冰山一角而已。人们不相

信客观知识。他们并不认为世界观是由知识积累形成的，所谓“知识”是用来引用和参考的，它反映的不是实际的现实，而是一种基本的世界观。

这对于战略而言有何意义？一般来说，它挑战了一种基于选择假设和选择良方可用性的战略理念，这些良方中就包括密切关注运行环境以及对事务的深谋远虑。在某些方面，自由主义经过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已经引以为傲地为战略决策创造了最理想的环境：政治言论自由、组织能力，以及尊重科学并将其作为明智选择、深思熟虑的手段。然而现在，新左派似乎认为它是有问题的，这种思考方式限制了选择范围，使得那些受到决策影响的人无法参与解决问题，而且它对于组织而言是种压力，意味着组织的等级化。

还有一种可能是，过多地操心目的和手段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战略任务在自鸣得意的文化大多数面前完全不起作用。年轻激进分子的渴望和报复已经超过了理性规划的范畴。因此，果不其然，出现了一种绝对目的战略。它既英勇又浪漫，它注定要失败却志向宏伟，具有一种高贵的诚实。它的目的是确认存在，而非实现目标。从这方面来说，这要归功于大西洋彼岸的法国存在主义者，他们深入思考了人类状况，其中虽然充满荒谬、放纵与绝望，但也强调了选择的必然性。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也许看起来强调的是行动无用，但其实他的观点是，绝望本身并不是消极忍受的原因。事实上，选择是必然的，因为人们“注定要获得自由”。他们无法选择生存环境，但他们被迫对此做出回应。这种回应无论勇敢还是胆怯，都是他们的责任，最终会界定他们的人生。⁷ 比萨特更有影响力的人物（至少在美国）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371

Gamus)。从政治上说，加缪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他持有强烈的反苏观点，并因此与萨特绝交。1940年，他还是个和平主义者，但在沦陷区的那段生活经历促使他投身抵抗运动，并加入了地下杂志《战斗》，从事编辑工作。他于1947年写成的寓言小说《鼠疫》，灵感便来自这段经历。小说描写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发生大规模瘟疫，人们一开始拒绝接受现实，但接着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有一群人找到了打败疾病的方法。人们在反抗瘟疫的过程中重新团结在一起。小说中的医生伯纳德·李尔将其中的道理归结为：“我只是说，在这地球上存在着祸害和受害者，应该尽可能地拒绝站在祸害一边。”⁸从加缪开始，人们争论的话题就变成即使面对严峻的困境，抵抗也会使生活有意义。因此，一个人只要行正直之道，就不必担心成为失败者，因为正直诚信比结果更重要。

米尔斯与权力

1962年，45岁的赖特·米尔斯死于心脏病发作。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至今，米尔斯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因为他那非同一般的个性，以及他随时准备把自己当作一个持不同政见者。⁹他是个典型的有自己看法的人，忠实于自己的价值观，自称是一个从不与任何政治组织合作的孤独者。他早期受到三种势力的影响，其中两种成为他形成自身思想的关键。其一是实用主义者，也是他的博士论文主题。在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方面，他和实用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的观点与詹姆士的反军国主义，以及杜威倡导的参与式民主存在紧密联系。与此同时，米尔斯又质疑杜威的准科学框架及其过于机械化的政治观点，杜威不愿意接受权力带来的问题，不愿意承认其中存在

的控制、情感和强制元素。¹⁰然而，米尔斯很欣赏的是，杜威始终认为智慧也是一种权力。虽然和杜威生硬的功能性平铺直叙相比，米尔斯属于猛烈抨击且具有价值取向的一类，但其实这两个人都固执己见、刚愎自用。 372

汉斯·格兹（Hans Gerth）是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者，他帮助米尔斯从哲学转向了社会学，并向他介绍了马克斯·韦伯的著作。米尔斯的基本解释框架，关于阶级、地位、权力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大型官僚机构在生活各领域影响的警示，都是从韦伯的观点引申而来的。米尔斯直到事业走上正轨才开始阅读并认真对待马克思的作品，之后他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米尔斯更多地是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他捍卫古巴革命并且与英国的新左派（由脱离了共产党且颇具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建立了联系。米尔斯对于学生们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变革动力，准备挑战惯性和保守主义力量。¹¹

米尔斯的著作中既有精妙的分析，也有带着灼热社会批判的研究调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他作为异见知识分子在国际上的名望逐渐升高，米尔斯的批判也变得越来越尖锐。他完全沉浸在权力的架构中：为什么在现代美国公司里，精英们无须暴力和强制，只依赖操控就能维持地位。他的目标是形成一个所谓的“多元”学派，主张即便公民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民主也能发挥作用。由于每个人都能从这样政治进程中获益，没有理由过喜或过忧，因此它就能有效而公平地运转起来。

有关权力的辩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米尔斯的著作《权力精英》经常被用来作为一方的论据，通常与之针锋相对

的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著作《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¹²。米尔斯和达尔的作品反映了在权力以及如何衡量权力这两个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观点，而双方的观点都与正在逐步发展起来的有关激进政治的辩论相关。权力曾经且现在仍然指的是一个政治实体的属性，以军事和经济力量这些公开明显的指标作为衡量手段。但显而易见，即便军事和经济力量十分扎实，也无法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强大的一方并不总能达到目的。必须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背景下考虑各种资源。一个扑克玩家可能有高超的技巧，而且握着一手对桥牌手而言的绝妙好牌，可这些牌却不是给扑克玩家准备的。因此推定的（putative）权力和实际的（actual）权力是不一样的，功能和效果是两码事，潜力和实际作用不可同日而语。¹³达尔对权力定义强调的是发挥影响力的能力：“A 对 B 享有权力，在这个意义上，A 可以迫使 B 去做一些他本不愿去做的事情。”¹⁴A 单具备能力还不够：只有 B 被迫服从了 A 的意愿，二者通过这种可衡量的效果形成十分特殊的关系，这才表现为真正的权力。

373

这种观点遭到了众多质疑，其中最具重要性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挑战并非来自米尔斯，而是两位政治学者：彼得·巴卡拉克（Peter Bachrach）和摩尔顿·巴拉兹（Morton Baratz），他们在 1962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 A 参与那些影响 B 的决策时，理所当然地是在运用权力。而当 A 致力于创制或加强各种社会和政治价值，以及使政治过程的范围仅仅限制在那些不损害 A 利益的

议题上时，同样也是在运用权力。如果 A 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B 都无法将 A 喜好范围之外的事物搬上台面进行讨论。¹⁵

这便是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它有不为人知的狡猾一面：A 通过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并制造一种背景共识，使 B 丧失向 A 发起挑战的机会，更无法在直接冲突中击败 A，这样 A 便能维护其在权力架构中的位置，实现对他人的权力。到五十年代末，这条批判线路已经完全被激进分子所接受，尽管和作者的初衷相比，其手法要粗糙得多，而且充满了叛逆意识。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认为，政府是统治阶级或者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大众意识的委员会，但米尔斯不这么认为。他将权力精英更多地描述为包括企业高管和军界领袖在内的一种官僚利益的融合，而不是一种有组织的阴谋，但他也一直认为制衡系统已经不起作用，这便催生了一种由特权集团垄断关键资源的观点，这样他们便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自己想要的。¹⁶

米尔斯在作为学者的同时，也渐渐成为一名檄文作者，“随时准备站出来肆无忌惮地提出控诉，就好像击中敌人胸膛上的目标一样”。¹⁷然而，他那朗朗上口的言辞也是社会学的延伸。从米尔斯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¹⁸中可以看出，他对主流社会学感到难以忍受，并嘲笑了他所认为的主流社会学的两条错误途经：一种是妄自尊大的大理论，另一种是游离在当代重要问题的边缘，埋头于微观研究的抽象经验主义。他坚持认为，社会学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将个人的麻烦和社会、政治架构结合起来。如果一个人失业了，那是一桩个人麻烦；如果 20% 的人口失业，那就是个结

374 构性问题，因而也就成了社会学的任务。他认为，就这一点而言，社会学应该是政治学的最重要准则。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满足政治想象力。他认为：“在完成一项研究之前，无论在情境上是多么不相关，你都要把它当作理解你自身所处时代——二十世纪后半叶可怕而有重大意义的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动向、形貌与意义的持久而核心的任务。”

《休伦港宣言》

——汤姆·海登擅长语言文字，他是首个用鲜活的语言来传递新思想的人物，是《休伦港宣言》的主要作者。这份宣言由60人于1962年6月讨论而成，据汤姆·海登后来说，当时大家感觉“正在表达新一代叛逆者的由衷之言”。¹⁹在此过程中，他们受到了许多人的影响。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阿诺德·考夫曼（Arnold Kaufman）向海登介绍了约翰·杜威，因为他阐释了社会机构的民主化。海登从加缪那里学到了一种思考方式，即反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赖特·米尔斯那里学到了一种对主流权力分配的批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加个人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再信仰天主教。但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对对自己的家庭感到非常不安。海登在米尔斯的作品中看到了在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当会计师的父亲的影子：“他骄傲地穿着硬挺的白领衬衫，他的会计师位置处于真正的决策者之下，凌驾于工会力量之上，他白天用铅笔写数字，晚上看电视喝酒，嘟嘟囔囔没有目的地发表着各种看法。”²⁰

米尔斯为海登解释了“在面对加缪所说的鼠疫时，人们之所以无心反抗、表现冷漠的诸多因素”。官僚精英们喜欢这种消极的不抵抗状态，根本不想去鼓励什么真正的民主。米尔